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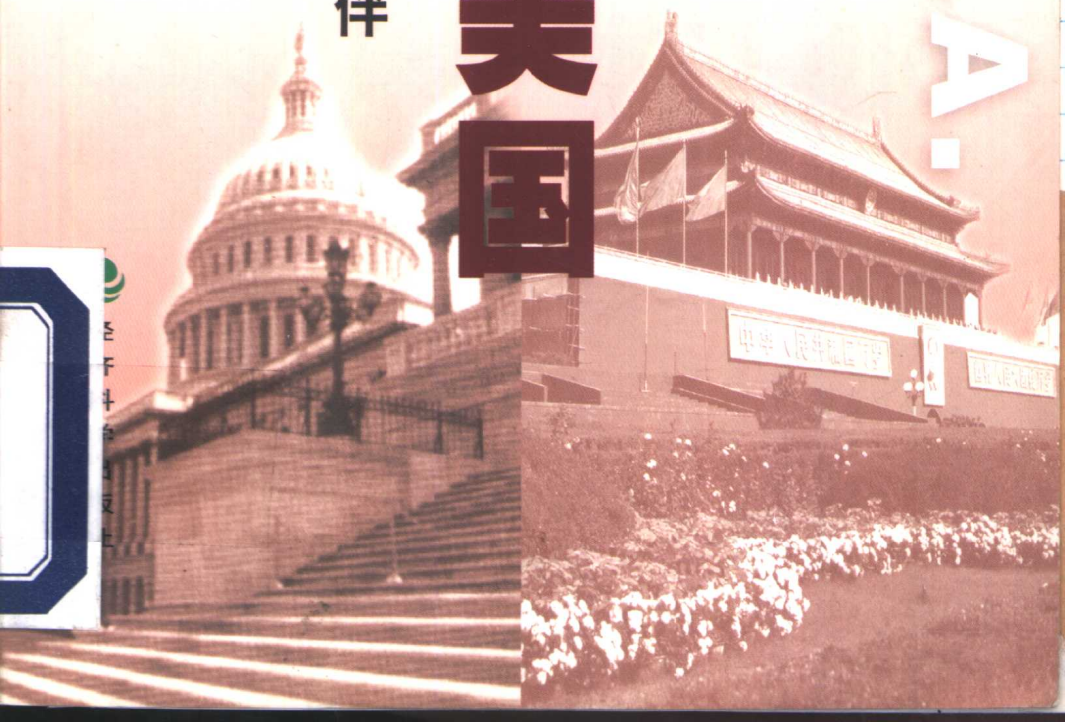
DUISHOU HAISHI HUOBAN

刘学成
李继东
主编

CHINA
U.S.A.

中国和美国

——
对手还是伙伴



中国和美国

——对手还是伙伴

刘学成 李继东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瑛
责任校对：董蔚挺
版式设计：周国强
技术编辑：董永亭

中国和美国

——对手还是伙伴

刘学成 李继东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万泉河路 66 号 邮编：100086

总编室电话：62541886 发行部电话：62568485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public2.east.net.cn

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

河北三佳集团装订厂装订

850×1168 32 开 7.75 印张 200000 字

2001 年 2 月第一版 2001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500 册

ISBN 7-5058-2404-X / F·1797 定价：17.8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在本书中,诸位专家学者对中美在政治、经济、国际安全、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关系,以及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笔者不揣冒昧,谨就世纪之交中美关系中一些新特点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中美两国相互认识日益深化,相互防范的意识增强

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的起伏和发展,使两国政府和社会对双边关系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对方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了解也已经较为深入;对于在哪些领域、哪些问题上双方有利益的融合,哪些问题上存在差异和冲突,双方的领导人、决策机构以至关心中美关系的公众,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这对于防止两国关系因出现突发危机而全面破裂,减少由于错误判断对方意图而出现本来可以避免的冲突,是十分有意义的。同时,两国在国家战略目标、国家利益方面的“底线”越来越清晰,发展关系的结构性障碍突出显现,相互警惕、相互防范的意识进一步加深。

在中国方面，由于中美关系经常成为新闻焦点，中美两国政府和民间交往急剧扩大，公众和官员对美国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有很大提高。同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相比，中国人对美国认识的变化表现在：

1. 不再认为美国是正在衰落的国家，而是对美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潜力和技术进步产生了深刻印象。用政治语言来说，就是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一国超强，多极化将会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

2. 认识到美国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美国在中国人心中的神秘感、陌生感逐渐消失。中国公众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仍然感兴趣，但更多的是用一种现实而冷静的眼光来观察。

3. 认为美国构成对中国最大的外部威胁。美国不希望中国强大，对中国采取“西化、分化”的战略，利用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破坏中国的国内稳定，也是实现中国国家统一的最大外部障碍。

4. 不再对中美政治关系的进一步改善抱有多大希望，同时也不太担心中美关系会严重恶化。用普通人的话说，就是中美关系“坏不到哪儿去，也好不到哪儿去”。

5. 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多元化，特别是对国会和行政部门的矛盾、美国对华政策决策过程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同冷战刚刚结束时相比，中国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明显上升，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也有变化：

1. 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有了更为深刻的印象，认识到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有巨大好处。

2. 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稳固的，中国能够维持政治稳定的局面。但是，美国主流政治派别和主流媒体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怀有敌意的。

3. 看到中国社会中利益多元化的趋势，对中国向资本主义和“民主化”的方向进行“和平演变”仍然抱有幻想。

4. 认识到中国作为大国而崛起是一个难以阻挡的趋势。部分美国人将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视为对美国的战略威胁；另一些美国人则在看到挑战的同时也看到两国发展合作的机会。

二、国内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上升

十几年来中美两国的交往急剧扩大，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在两国交往中发挥作用，获得利益。因此，两国国内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上升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使双方的外交决策过程进一步复杂化。

在美国方面，除了国会对总统和行政系统的掣肘充分暴露之外，行政系统内部在对华政策方面的部门观点、部门利益也更加突出。在当前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机构有白宫班子、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起重大影响的机构还有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商务部、贸易代表办公室、中央情报局等。这些机构从总体上说是协调的，但也有内部矛盾。特别是一些负责功能性问题（军控、贸易、人权、环保、扫毒等）的机构，往往不惜损害对华关系而推进其具体的功能性目标。

政府之外的美国社会力量对中美双边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美国企业界特别是一些跨国公司和财团在对华关系中的作用主要是积极的。但是，美国纺织、机电等行业的制造商，同劳联—产联等劳工组织一起，攻击中国“压价倾销”、“出口劳改产品”等，呼吁援引“反倾销法”制裁中国。劳工组织成为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中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的强大力量。军工集团则出于其利益需要，对“中国威胁论”和对台军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美国，新闻媒体被说成是“第四个权力中心”。美国主流媒体中负面的中国形象，是改善中美关系的一大障碍。

对外政策方面的重要思想库包括对外关系委员会、兰德公司、大西洋理事会、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凯托研究所、布鲁金斯基学会、美国和平研究所、国会研究部等等，还有各大学的有关研究中心。它们的政治倾向各异，绝大多数标榜其独立于政府的色彩，但又都同官方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力图影响官方政策。一些主要思想库的政策建议往往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

美中关系中许多问题，特别是民族、宗教、人权、台湾等问题，其背后都有美国宗教势力的影子。绝大多数宗教团体对中国的误解与偏见较深，但又有很强的动力向中国进行宗教渗透，并因此而不希望同中国的交往渠道堵塞。

“美国至上”的狭隘民族主义主张，在美国舆论界的国际评论报道中频频反映出来。一些保守派以攻击中国作为自己的一种政治资本。“新孤立主义”虽是对美国推行海外扩张和干涉的一种牵制，但其所包含的贸易保护主义、排斥新移民、否定多元文化的倾向，都是将美国国内经济和社会弊病归咎于外部世界，因此也是造成中美摩擦的现实因素和深层原因。

在中国方面，对中美关系起重大作用的一个因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一元化的根本指导思想，同社会利益、价值取向、思想文化的多样化并存。政治意识较强的中国公民，都非常关心中美关系的进展，因为中美关系的起伏发展同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思想观念的变化相互关联，以致在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股票市场上反映出来。中美关系和美国政治、经济、技术发展，一直是新闻媒体报道和评论的一大焦点。在党政领导部门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参与到对

美政策的决策、咨询和执行过程之中。除了外交、外贸、军事、国家安全等一直负责直接处理对美关系的部门以外，所有重要的经济部门，以及台港澳事务、宣传、治安、司法、民族、宗教、环保、民政、科技、教育等部门，都对中美关系起着一定作用。

在这样复杂的决策机制和社会环境下，全面准确地贯彻中央领导关于中美关系的战略部署和方针决定，是有相当难度的。这些年来，对美关系能够维持基本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对美政策的稳定和各个决策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一些中国公民表达对美国霸权的义愤，另一些公民则更强调冷静观察国际变局，维持对美关系稳定。涉及对美关系的政府部门，在严格执行中央政策的同时，各有其关注的重点和具体工作目标。在发行量很大的《环球时报》、《世界知识》等报刊上，在研究国际问题的许多专业刊物上，也可以看到关于中国外交和中美关系的不同见解和观点交锋。这些都是十分自然、正常的现象。

但是，对于这些正常现象，美国人却往往作出偏离事实的判断。他们时而将中国媒体先后刊登的代表个人不同见解的言论，理解为中国官方观点的变化；时而宣扬这些文章作者代表他们所在的工作单位，因而他们观点之间的差异显示了中国各个部门的观点不同。这样就使美国方面对中国对美政策的解释更容易出现偏差。

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的矛盾十分尖锐

冷战接近尾声及刚刚结束时，一些研究者提出一种观点，认为从此以后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和现实利益考虑增加，意识形态作用将会下降。从近年来美国以及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华政策看，这种观点是值得重新思考的。中国人

一直呼吁美国放弃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超越意识形态分歧，以国家现实利益为基础推进中美关系。但是美国非但没有接受这种观点，反而变本加厉地推行对华“和平演变”战略，利用台湾、人权、民族、宗教、“法轮功”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依笔者管见，发展中美关系最大的结构性障碍，是两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方面的巨大差异。由于苏联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美国也尚未将中国确定为战略敌人，用“反共”二字来概括当前美国意识形态，是远远不够的。

美国历史上形成的上层建筑，仍能基本上适应全球化时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美国意识形态的主要基础，包括宗教传统、个人自由、保护私有财产、民主意识、法治观念、限权政府、市场需求主导经济发展的思想、自由贸易思想等等，仍然根深蒂固。与此同时，从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传统思想中都衍生出一些新的特点或观念。比较明显的是，保守主义强调回归宗教，而自由主义强调多元文化主义。美国社会中宗教右翼势力影响上升，宗教组织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愈加活跃。保守主义呼吁美国人维护白人基督新教的传统价值观，担心价值观的多元化削弱美国的民族凝聚力。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建立在美国种族构成变化（白人比例降低，其他族群比例提高）的基础之上。一些思想家主张，传统的白人新教文化不应继续成为美国文化的主流，而应当以一种能够将各种宗教和文化的优点集中起来的新的价值体系，把美国社会凝聚起来。这种对多样性的尊重是从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发展起来的，而且已经深深地扎根于美国社会之中，成为一种所谓“政治正确性”。同多样性的观念密切相联系的是“宽容原则”，提出美国社会的稳定和统一，需要由对异己力量和观念的宽容来维系。

美国政治思潮中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虽然在国内经常吵得不可开交，却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找到共识，在国外各有其攻击对象，许多时候还出于不同的借口而一致对外。比如对于中国批判“法轮功”的政策，宗教右翼攻击的借口是中国“压制信仰自由”，而自由派反对的理由是中国政府不够“宽容”，不能容忍社会的“多样性”。在中国的台湾问题上，共和党右翼以“维护国际安全”为由要求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甚至主张提供对台湾的“安全保障”，而民主党自由派则对台湾的“民主化”赞赏有加，攻击中国的统一主张是“以独裁政权压制民主社会”。

美国人提倡的“全球化”，面目比较容易认清。但有人以为，反对全球化的新孤立主义无非是主张美国固守国内阵地，反对在海外扩张干涉，岂不很好？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新孤立主义是几种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的一个大杂烩。许多新孤立主义者主张一切都应是“美国优先”，其实是美国白人优先，排斥新移民。他们反对对外援助，反对交纳美国拖欠的联合国会费，但却不一定反对美国增加军费。新孤立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是贸易保护主义，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区，主张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更反对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

美国是大国中最具宗教意识的国家，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中意识形态色彩最浓的国家。希望美国能够在外交上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完全着眼于国家利益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是一种良好的愿望。美国的历史传统和今天的社会现实，决定了美国是绝不会淡化其意识形态的。

对于美国外交和对华政策中的这一特点，中国人已经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将中华民族凝聚起来的最大精神力量是爱国主义。中国将美国视为实现民族振兴、国家统一的最大外部障碍，因此在中国爱国主义的外部斗争对象中，首当其冲的是美国。对于美国以其傲慢的超级大国心态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

时，必然遭到中国人爱国主义情结的强烈抵制。如果说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那么美国民族主义同中国爱国主义之间的尖锐矛盾，是未来中美关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精神因素。

中国不主张在国际关系中突出意识形态分歧。然而我们在国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坚决抵制“西化、分化”的图谋，同美国对“和平演变”的期待和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针锋相对的。这一对矛盾将如何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四、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发展不同步

十几年来，中美关系的风风雨雨，展现了国际关系史上没有先例、难以解释的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经贸等方面的往来急剧扩大，双边贸易额从1990年以来翻了两番多，从200亿美元增加到900亿美元以上（美方统计）。如按照美方统计，美国不仅是在中国投资最多的国家，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科技、教育、法制等诸多领域，美国同中国合作与交流都超过任何其他国家。一个代表双向交流迅速扩大的数字是，1999年从美国直飞中国大陆的商业航班每周有27次，到2001年预计将达到每周54次。

另一方面，中美双边政治关系却经常大起大落，经历了“六四”风波、李登辉访美、美国导弹袭击中国驻南使馆三次严重危机和无数次大小“地震”，至今没有完全稳定下来。

更令人担忧的是，“台独”倾向的发展，使人不能不设想中美之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2000年5月，过去一直坚持“台独”主张的台湾新领导人正式登台。今后的台湾政治和两岸关系难免麻烦不断。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摊牌，只是一个时间

和方式问题。

美国同日本联合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已成定局，同台湾搞 TMD 合作也在筹划之中，对台湾的武器出售有增无减，这些都增加了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军备控制问题可能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一个新的焦点。美国在中国周边布局造势，企图利用南海、中国国内的民族宗教等问题牵制中国，使中国的安全环境复杂化。美国国内的反华舆论未见明显收敛之势。从这些事态发展看，今后几年的中美政治关系也不会风平浪静，不能排除出现突发事件而又一次下滑的可能。

这样看来，中美通过关于中国加入 WTO 的协议、美国国会通过 PNTR 决议等等中美在经贸关系中的进展虽然有一定的政治减震作用，但中美经贸关系和政治安全关系仍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政治上相互不信任，战略上的敌意增加，不是经贸关系的加强能够补救的，现实的经济摩擦必然会政治化。反过来说，发展两国民间关系的内在动力和积极性，也不会因为政治突发事件和安全问题上的对峙而受到多么大的挫折。这是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在中美关系中的必然表现。中美关系要想稳定下来，经济合作和政治关系必须朝向同一个方向发展。这需要很长的一个“磨合期”。

五、在两国全面交往中，已形成处理危机和预防冲突的一些机制

笔者在近年来研究工作中的一个体会，就是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如果仅仅阅读中美两国媒体关于双边关系的报道和评论，容易得到两国之间矛盾尖锐、危机不断的表面印象。究其原因，主要不在于某些媒体的报道不够全面，而在于两国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全面交往，很难通过媒体反映出来。两国政治关

系起伏不定，两国媒体之间几乎每天发生唇枪舌战是一个重要的事实。但这个事实容易掩盖另外一个事实，就是美国是同中国交往最深、交流范围最广的一个国家。中国同日本、欧盟的矛盾远没有中美矛盾这样尖锐，中国十分珍惜同俄罗斯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但中国同任何其他国家的交往都没有达到、今后也很难达到中美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从美国的对外关系看，美国同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大国的政治矛盾没有美中矛盾这样突出，但同这些国家的交往也还没有达到今天同中国交往的广度和深度。

中美交往的程度之深，反映了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强大的内在动力，也是防止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危机转化为全面冲突的重要“预警机制”。实际上，两国元首业已建立的热线和在国际场合的经常性会面，以及两国政府、军方各个渠道的联系，已经构筑了避免全面对抗的一些防线。美国克林顿政府在过去几年里反复重申它奉行全面交往的对华政策。中国对美政策也越来越重视同美国社会各界的全面交往。这种全面交往同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是一致的，尽管两国的战略目标截然不同。

王缉思

2000年10月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中美在伙伴和对手之间寻找平衡	(1)
第二章 冷战结束以来的中美关系	(18)
第三章 世界多极化与中美关系	(42)
第四章 国际安全与中美关系	(76)
第五章 经济全球化与中美经贸关系	(109)
第六章 展望新世纪中美文化关系	(125)
第七章 人权外交与中美关系	(140)
第八章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160)
第九章 美国对台湾政策的调整	(187)
第十章 美国对华决策中的心理因素	(203)
附录 1: 中美联合声明	(216)
附录 2: 共同构筑面向新世纪的中美关系 ——在纽约美友好团体举行的午餐会上的演讲 江泽民(222)	
后 记	(229)

第一章

中美在伙伴和对手之间 寻找平衡

冷战结束已经 10 年了，人类即将跨过 21 世纪的门槛。冷战时期形成的以美、苏为首的两极世界结构已经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瓦解，新的世界格局正处于过渡和形成过程之中，美国致力于建立以其为主导的单极世界，而中国等国主张建立多极世界；美国力图维护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这一体系，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美国经济长期强劲发展，它作为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地位非但没有削弱，而且得到加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长期以世界最快速度发展，其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高。跨太平洋而立的中国和美国的 关系又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世纪之交，中美两国最高决策层正处于新老交替。面向 21 世纪，两国关系应该是什么性质的关系？两国关系应该沿着什么方向发展？两国关系发展的框架如何构筑？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不同性质、方向和框架会对两国未来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影响？会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造成什么后果？领导两国进入新世纪的政治家高瞻远瞩在严肃地思考着，两国的国际问题专家各抒己见在激烈地辩论着，两国人民为两国的和睦、友好与合作在期盼着。

1997 年，中美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宣言，中美两国决定致

力于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自那时以来，两国领导人多次重申建立这种关系的决心。然而，在各种政治势力和各种学派专家中，支持的大声疾呼，反对的振振有辞；乐观的确实有之，悲观的也不乏其人。各派均能编织一套理由和罗列一些事实支持自己的立论。本文试就这种新型战略关系的现实背景、理论依据和政策演绎诸方面进行初步探讨，为这场大辩论的健康发展做出我们的一份贡献。

一、战略伙伴关系产生的背景

1997 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会谈结束后双方共同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就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1998 年，克林顿总统对中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就中美关系中的的一些重大问题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进一步推动了中美关系沿着两国元首确立的方向向前发展。世纪之交，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并发表确立两国关系发展框架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件举世瞩目的重大国际政治事件，它对新世纪世界格局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为 21 世纪持久、稳定和健康的中美关系确立了发展的框架。

2000 年 9 月 8 日，江泽民主席同克林顿总统在纽约举行了正式会谈。江泽民主席指出，中美作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大国，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负有共同的历史责任。近几年来，中美关系尽管几经风雨，但总的趋势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中美两国保持并发展健康、稳定的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在进入新世纪的历史关头，中美两国政府和领导人都要站得高，看得远，牢牢把握两国关系的大局，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

扩大交流，加强合作，妥善处理双方的分歧，特别是要处理好台湾问题，使中美关系在新的世纪里健康、稳定、持续地向前发展，这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与繁荣。

克林顿总统表示，在他就任总统的 8 年来，美中双方进行了良好的合作。两国领导人亲自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两国拓展了各种沟通渠道，并努力争取人民对发展两国关系的支持。美方真诚地希望美中两国实现真正的合作，希望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以建设性的方式参与国际事务，也希望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取得成功。两国元首的讲话为两国关系在新世纪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代表了两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江泽民主席在纽约期间，美国对华友好团体举行大型午餐会欢迎他。江泽民主席在午餐会上发表了题为《共同构筑面向新世纪的中美关系》的演讲。江泽民主席指出，人类正在跨入一个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面对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世界，如何把一个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带入 21 世纪，是摆在我们两国人民和政治家面前的紧迫课题。为了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彼此的国家 and 人民。中国正在积极地了解美国，美国也应该积极地了解中国。

江泽民主席在介绍中国的情况时指出，中国人民需要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中国的发展只会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起到积极作用，而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

江泽民主席还阐述了中国在全球安全、防止核扩散、环境保护、打击国际犯罪等问题上加强国际合作的立场。他再次呼吁中美两国政府都应顺应时代潮流，倾听两国人民的呼声，求同存异，扩大合作，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